

《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

李新伟

20世纪80年代末,我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求学期间,良渚文化反山和瑶山的琮璧黻纹以令人惊叹的繁缛深邃刷新了我对中国史前时代的认知。1993年至1996年,追随任式楠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便选择以良渚文化的分期为论文题目。1995年,第一次到良渚,在瓶窑工作站住了一周,观摩典型陶器。论文终于完成,现在看来,主要是综述已有成果,并无新意。此后,不断学习良渚文化的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但从不敢以良渚文化研究专家自居。2020年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所长希望我参加良渚博物院组织出版的“中国早期文明丛书”工作,写一本良渚文化的书。我先是推辞,“江东子弟多才俊”,对资料的熟悉程度和研究水平都非我所及。但禁不住所长劝说,自己想想,这也是向良渚先民致敬的机会,就答应下来。

生出虔诚的致敬之心,是因为良渚文化持续重大发现的震撼,也缘于自己对良渚先民精神世界探索的感悟。

30年来,丰富的考古资料已经充分展现了良渚社会的聚落程度。良渚古城、大型水利系统、密集的先民聚落群、宽广的稻田、成吨的稻谷……考古遗存表现出的规模惊人的人力物力和社会组织力,已令很多学者相信良渚社会是王者统治的早期国家,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最有力实证。良渚社会的领导者,身佩琮璧黻纹,俨然王者气度。山河寻璞、切割琢磨、精雕细刻、盛装威仪、仰天俯地、人幻通神……这些玉器从原料的获得到制作、使用、赏赐和入葬,反映的是良渚王者通过对珍贵资源的掌握、对特殊技艺的控制,物化并独占沟通天地的宗教权力,由此获得经济和军事权力,成功构建我们文明最早的国家级别政体。如此开创性的政治实践,理应让人肃然起敬。

与30年前相比,我们对距今5300年至4300年,即良渚孕育、成长、繁荣和衰落的大时代里,中国各史前文化区的交融碰撞和

波澜起伏有了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这个时代之前数百年,各地区已经发生跨越式发展,江淮之间的凌家滩遗址和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志趣相投,共同开启了以宗教凝聚人群的政治实践;良渚所在的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采取了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相似的发展道路,更重世俗礼仪;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的庙底沟类型则独具“集体取向”,各地之间发生以上层交流为核心的密切互动,催生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距今5300年前后,庙底沟的解体造成中国西北的“西高地”广大地区的人群迁移和文化互动,而“东平原”地区则出现大汶口的持续发展 and 西进,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的转变和后者的北进,凌家滩遗址神秘消失。良渚的王者,是如此壮阔的动荡整合造就的英雄;良渚早期国家,是各地区撞击和熔合的灿烂结晶。持续千年的创造性实践,虽然最终未能保持“神王之国”的延续,但其榜样作用,对距今4300年至3800年孕育夏王朝的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这样“最初的中国”的视野下,我们会对良渚王们的地理知识、“天下观”政治理想、宗教观念和统治策略的形成及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从玉琮与凌家滩玉筒形器和玉版的相似中领悟出传承,从琮的独特形制,以及璧、冠状器、锥形器和形式统一的神人兽面的骤然出现中感受文明勃兴时刻的创造力,也会从良渚风格玉器的流传和演变中获得对良渚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独特地位的正确认识,油然而生出敬意。

30多年前,张光直先生提出中国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并把这整个文化背景

审视我国1万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研究新视角,可以有效地聚焦到充分体现中国性的玉文化方面。

中国人崇玉、尚玉的文化也可追溯到距今1万年的旧—新石器时代之交。“玉成中国”的理论要义是按照传统的中国本土话语,并依据考古发现的史前史新材料和新知识体系,重新阐发5000年文明古国所以然的一种尝试。我们知道,在中国代表统治者的“王”字,其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汉字中就像是1件玉琮的素描图。玉琮,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中国南北方各地,即作为王权和军权的符号化圣物,而发挥统治效用。

从理论方面讲,所谓“玉成中国”原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理解:

第一,自然地理意义的解释。

打开我们国家的版图,其地理空间分布的东西两极方向,恰好都分别储藏丰富的优质玉矿资源,这是人类独有的玉文化发生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基础,这是天赐的财富,可遇而不可求。在国家版图的东极方面,玉矿资源储备以溯临鸭绿江的辽宁省岫岩玉和宽甸玉为代表;岫岩玉又称长白山玉,因为从海城到岫岩一带的山脉皆属于长白山的余脉。西极方面的玉矿资源丰富,则更显得地域广阔,包括新疆和田的昆仑山脉和喀什地区的喀喇昆仑山脉,绵延数千千米。最西端的玉矿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马尔汗墨玉矿,出产黑青色的优质透闪石玉料,俗称“塔青”和“墨碧”等,先秦古籍则称之为“玄玉”。马尔汗墨玉矿的地理位置,距离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的红其拉甫口岸仅有几十千米而已。

至于我国版图北方和南方的两极,也同样分布着极其重要的玉矿资源,不过二者的大宗均存在目前的国界之外:北面是贝加尔湖南岸山地的优质透闪石玉矿(俗称“俄料”),是全球范围内玉质仅次于新疆和田的高等级玉料;这也是整个欧亚大陆上驱动旧石器时代后期玉文化率先发展的物质基础。南面则是与云南省接壤的缅甸山区的全球最优翡翠矿。贝加尔湖玉矿,自1万年前就开始向国内方向传播(参看本书《万年玉源》一章),对于我国玉文化的发生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是,贝加尔湖玉料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衰落以后,便基本停止其南传的步伐。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又作为新疆和田玉的替代资源而被大规模开发并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南方的翡翠则在明清时期规模性地输入我国,先为清王朝宫廷贵族所喜好,随后普及整个上流社会,乃至发展为当今我国玉文化中高档奢侈品资源的半壁江山,与新疆和田玉平分秋色。如此看来,我们巨大的国家版图的东南西北四极方向上,居然皆有美玉矿藏为标识。为什么会如此巧合?除了用汉语成语中的“天造地设”来形容,恐怕不会有更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这样奇特的自然地理现象。

第二,文化基因意义的解释。

何谓『玉成中国』

《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序

叶舒宪

文化基因意义的解释是将史前先民生产和使用玉器的行为及其结果,视为一个以美玉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我国玉文化的分布版图同样很广,我们看最早成系统使用的汉字,即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其使用所覆盖的区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狭小范围;而玉文化分布的版图范围,至少在4000年前就是后来甲骨文使用范围的十倍以上!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的武威,从东北三省到岭南两广地区和东南部的台湾岛,玉文化以惊人的传播力,先统一了东亚的广大地域。

而玉文化从发端至今,大约刚好构成整整1万年以来以玉器为主角的历史叙事。这是古代人士和前辈学者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神奇故事。

玉文化叙事的年代之深远,足足顶得上使用甲骨文以来汉字叙事历史的三倍以上!

如果要筛选出一个汉字,代表这个以美玉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那么不会有比“国”字更合适的候选字了。“国”字的出现,可不是天造地设的自然安排,而是华夏民族文化信仰选择之结果。从“或”的繁体字“國”,代表用武器来守护城池内的国家重要珍宝。如今的简体字“国”,早在魏晋以后的古籍中就出现了,称为古代的俗字。

“国”字的四方外框,代表人为修筑的四方城池之城墙,四方围住的中央,便供奉着中国人信奉的世间价值最高之物——玉。汉字中的“玉”和“王”字,二者几乎是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

如果说在中国巨大国土的四级方向,以出产美玉之山水为自然标志,那么华夏的造字祖先们,早在汉字甲骨文产生的几千年前,就已经是玉石神话崇拜的虔诚信徒。从甲骨文的构形来看,商朝的国号“商”字,代表王者之器的玉璧的“璧”字,代表王者的“辟”字,神圣化动物“龙”字和“凤”字,这五个完全不同的字中,都有一个标记神圣化美玉的结构要素,即“辛”。古文字学界目前已经较为一致地认同如下观点:在甲骨文“龙”字、“凤”字中,神圣动物头顶上方的这个“辛”,就是玉器的符号。具体而言,有玉钺说、玉冠说、玉璋说、玉圭说和玉柄形器说,等等。

如果没有甲骨文汉字出现之前六七千年的玉文化发展做铺垫,这样的造字现象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而如今,这一段为甲骨文汉字出场做铺垫的史前文化史脉络,已经日渐清晰起来,这给当代知识界带来的启迪,完全是预料之外的,也具有非常关键的迭代意义。

本书,便为此而编写,邀请国内的考古学家、博物馆馆长、人类学研究者,分头聚焦各大重要的史前至夏商时期的玉文化遗址,简析其出土玉器群组的情况;再将这些遗址的玉文化面貌整合为一体,上升到驱动文明

后记

叫作“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立论的证据之一就是良渚玉器蕴含的萨满元素与玛雅文明的神似。今天,中国考古学家已经走进玛雅世界,开始自己的考古项目。我对良渚文化宗教观念的一些新思考,正得益于对玛雅文明的学习。面对科潘王宫区仪式大广场中玉佩琳琅,羽地之间发生以上层交流为核心的密切互动,催生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距今5300年前后,庙底沟的解体造成中国西北的“西高地”广大地区的人群迁移和文化互动,而“东平原”地区则出现大汶口的持续发展和西进,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的转变和后者的北进,凌家滩遗址神秘消失。良渚的王者,是如此壮阔的动荡整合造就的英雄;良渚早期国家,是各地区撞击和熔合的灿烂结晶。持续千年的创造性实践,虽然最终未能保持“神王之国”的延续,但其榜样作用,对距今4300年至3800年孕育夏王朝的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常怀这样的敬意:细观器形方圆、纹饰连螭、神目鹰张、獠牙突兀的精微之处,思绪如地纹上的万千旋云,与正在羽化成飞鸟的神王悠然意态。时间仓促,学识有限,疏误难免。感谢良渚博物院夏勇、贾艳两位学者的严谨审核,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刘鑫等同学准备图片资料,也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宋佳佳的专业编辑。他们的付出,已经更正了很多令人汗颜的错误。但我仍然心中惴惴,期待读者的指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

作者:李新伟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起源的国家文化信仰和意识形态高度,努力揭示多元一体文明国家格局由来的奥秘。

若将这1万年的玉文化叙事从中间分为两段,即对应通常所说的“上五千年”和“下五千年”。其中更为精彩绝伦的内容,是一部完全发生在中华“上五千年”间的玉文化发生发展史;若不是紧盯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去做专业的细致梳理和大胆探究,古往今来还真的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内容。

本书的十三章内容,除了末章是讲述玉石之路的文化传播作用以外,十二章的主体都是介绍考古发现的史前至夏商时期玉器分布的重要遗址。前七章内容,从万年前的东北玉文化曙光到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玉器辉煌,催生以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大繁荣,再到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随后的龙山文化,中原仰韶文化与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的互动,以及距今5000多年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登峰造极,这些重要遗址都能透露出源自中华“上五千年”的社会生活信息,合起来构成一幅玉文化自北向南发展,先传播覆盖东部沿海地区,再自东向西发展的全景图。

本书按下卷的那章,分别介绍“下五千年”间的第一个千年发生的玉器故事,即相当于唐尧虞舜到夏禹夏启建国的这一时间段。涉及四大考古学文化的玉器分布情况,分别是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代表,甘肃青海一带的齐家文化遗址、陕北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遗址和广东韶关的峡峡文化遗址。四地的玉文化面貌相距数千千米,各不相同,其中的后者明显传承着“上五千年”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体系,即都以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的组合礼器为标志。这就清楚地显示出史前玉器体系化、成熟化的标志为良渚文化。在良渚文化消亡之后,这个体系并没有伴随江南良渚古国的覆灭而消失,反而是向中原、南方等几个方向不断传播。这才有笔者在第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后成书的《玉文化统一长三角》之论断:经历数千年发展后,玉器传统率先在良渚文化时期形成对固定的组合体系,统一了整个环太湖地区的礼制制度,该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随后辗转传播到中原地区,奠定了夏商周国家的玉礼基础。简言之,玉文化在距今5000年之际先统一长三角,其后又在距今4000年之际,大体上统一了中国。其后一掌聚历史上传称夏商两代的玉文化,除了中原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玉器外,旁及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两个遗址:三星堆和金沙,其用玉年代相当于西周末周初。中国史前玉礼器的种类在此回光返照一般地集群呈现。

(摘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总序)

《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主编:叶舒宪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4年7月

步入21世纪,夏文化探索进入积淀深究的新阶段。二里头、新砦、王城岗等遗址的新发现刺激了有关夏文化问题的讨论,其中以早期夏文化探讨最为热烈。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新媒体急速发展,夏文化探索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夏文化探索的关键问题为纲,立足《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所收录18位专家学者的访谈内容,简要介绍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何为夏文化

夏文化概念兼具考古学与历史学色彩。徐旭生先生在《1959年豫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提出“夏文化一词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1977年“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先生总结性地提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

目前,学界探索夏文化时大多以夏鼐先生所提定义为基础。不过仍有不少学者对此做过探讨。王巍先生、王震中先生的访谈中涉及到夏文化定义问题。

王巍先生认为“夏鼐先生的定义是比较准确的”,他说道“夏文化是指夏代以夏族为核心的以及臣属于它的一些小的邦国构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产”。这实际上是在夏鼐先生的基础上,对夏文化的时空范围、族属范围和内涵进行了扩充和说明。王震中先生认为夏是“复合制国家”,他认为夏文化应为“夏王朝时期夏后氏(夏王族)的文化”,“把夏文化定义为夏的王邦及王畿所在地的文化,会更合适一点”,“实际的可行性要高一些”,这实际上是对夏文化的空间、族属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

“夏文化”定义是夏文化探索的概念前提。夏文化定义的探讨隐含着不同学者对夏王朝时空范围、族属、文化内涵的判断;对考古学文化、族群与王朝转化对应的理论思考。目前,各家夏文化定义主体相近,细处有异。随着夏文化探索的深入,这一问题将无法回避。恰当的回答该问题不仅有助于夏文化研究,更有助于中国考古学的理论进步。

夏文化之首及夏代积年

夏文化之首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夏文化本体的指认。目前,关于夏文化之首的探讨主要有两类基本态度:一是早期夏文化要在二里头文化之外寻找(探索对象包括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址、后岗二期文化等);二是早期夏文化要在二里头文化中寻找(探索对象包括“新砦类”遗址、或排除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等)。这两类观点在时间、空间上均互有重合、矛盾之处。但其症结多在“夏代积年”问题上。

李伯谦先生对夏文化有系统性看法,他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与新砦期遗址是早期夏文化探索的主要对象。张松林先生在郑州地区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他认为“所谓的新砦期其实就是嵩山北麓地区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址,只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才能与夏代早期遗址相当”,“张国立先生认为夏王朝自‘启’始,新砦期遗址就是早期夏文化。王巍先生认为夏代前期遗址发掘尚不充分因而对当时社会面貌不是很了解。这也是赞同早期夏文化要在二里头文化之外去寻找的态度。方燕明先生曾主持瓦店遗址发掘,并认为该遗址可能与“阳翟”或“钧台”有关。赵春青先生认为新砦一期城址为“夏启之居”,新砦遗址第二期是太康夏国、后羿代夏阶段的遗址。方辉先生认为“河南龙山也就是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进入夏,二里头一期后是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王震中先生亦认为夏文化的年代应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开始。

袁广阔先生虽然认为二里头文化不是夏文化的全部,但他受王国维、沈长云先生的影响,认为“夏代早期主要活动在河济地区”。他提出“后岗二期文化为早期夏文化”,“新砦期都不是早期夏文化”。

刘绪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文献记载的夏积年可能过长。他推算夏代与二里头文化年代跨度大致吻合,认为“夏代起始之年可能没有那么早”,孙华先生也表示“偏向刘绪老师的看法”。这一观点否定了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的记载,提出此观点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文献记载更迭有所缺漏的可能。

董琦、李维明先生继承邹衡先生的学术体系探索夏文化,认定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郭引强先生亦信从此说。董琦先生认为有学者将“王城岗大城与禹都阳城”时期、新砦遗址与“后羿代夏”时期、二里头遗址与“少康中兴”时期相对应,是混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表现”。李维明修订新密黄寨遗址出土的牛肩胛骨上有“夏”字,在某种程度上为该说提供了文字证据。

要之,虽然各家学者将考古遗存与历史事件对应说法不一,但“早期夏文化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的观点似乎得到更多学者的支持。近些年早期夏文化探索的主要对象也集中在王湾三期文化及“新砦期”遗址上。

夏文化之尾

夏文化之尾的讨论多表现为夏商及夏商文化分界的争论、新旧“西亳说”与“郑亳说”的争论、“偃师商城界标说”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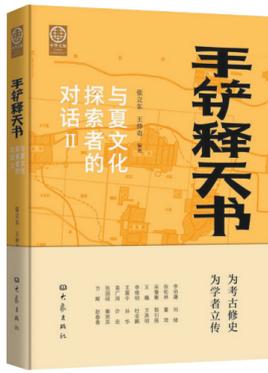
李伯谦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亳’没有问题”,也同意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实现了“商灭夏”的政权更迭,但具体发生在哪一段,先生自述“因为没有做过完整研究,也不敢说的太绝对”。王巍先生与杜金鹏先生坚持“偃师商城界标说”。杜金鹏先生在偃师商城的考古实践中放弃了原先夏商文化分界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之间的观点,转而认为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1段的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是夏商文化的分界界标。作为“三期四期分界说”首倡者的孙华先生,其观点亦稍有变动,他认为“夏商更替的社会变动发生在二里头遗址第三期以后,第四期中的某个时段”。

刘绪先生曾撰写多篇文章对“偃师商城界标说”进行质疑。他虽倾向“郑亳说”,但未曾论证郑州商城

问夏有声: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评述

王仲奇



一定是毫。他认为受发掘工作限制,“南亳”“北亳”之说的讨论空间尚存。

董琦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成汤亳都所在,是夏商文化主要界标。宋豫秦先生在豫东、鲁西地区的考古工作及对夷夏商三者关系的讨论,可视作他为“郑亳说”提供的佐证。郭引强先生曾与蔡运章先生合作《商都西亳略论》,认为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也是盘庚所迁之殷。他在访谈中表示当时研究“思路并不十分清晰”。李维明先生则始终坚持“郑亳说”,他在郑州二里头出土的牛肋骨刻辞上补识出“匕”字,“为郑亳说补充了商代文字证据”。张国硕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王太康以后到夏桀的夏代中晚期文化”,并用“主辅都制”解释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关系。赵春青先生同样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晚期的遗存。

方辉先生考察“南关外期”遗址,认为其是夷商联盟到达郑州之后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际短时间内形成的遗存。袁广阔先生则着眼于二里头遗址大型建筑的废弃与偃师、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外来文化因素的出现,认为“夏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王震中先生也认为夏商文化分界在第三、四期之间。

综上,关于夏商文化分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二里头四期某段划限;二是二里头文化全为夏文化;三是二里头三、四期之间划限。目前来看,第一种观点影响更为广泛。各家说法最多也仅在一期之差,或可说已经逼近通过考古学来考察政治历史变动的极限。夏商更迭之争的另一表现则为汤都亳地望之争。至于亳都所在,各家仍有争议,不过“郑亳说”更为强势。

夏文化探索的态度与展望

李伯谦先生坚信有夏,并认为“夏代年代学是已经解决的问题”。王巍先生着重强调考古学家的作用,并非只有发现文字才能断定不是夏。孙华先生认为夏代发现文字的可能性很小,但并不意味拒绝识别夏文化非要有文字证据。

刘绪先生认为夏文化的上下限仍是主要问题,对待夏文化应积极探寻。同时,刘先生以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为例,说明未来夏文化探索将走上多学科结合的道路。方辉先生认为“夏王朝、夏文化是确实存在的”,同样提倡应该引入科技考古,尤其是与人骨相关的生物考古方法探索夏文化。

董琦先生提醒道“不要轻视甚至排除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关键性作用”,“夏文化仍在探索阶段”。方燕明先生的态度较为审慎,他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从考古学文化转换为夏文化、夏王朝、夏族的路径”。因此他重视手头材料的重要性。赵春青先生认为寻找公共墓地是目前新砦遗址发掘急需开展的工作。杜金鹏先生指出“盘桓在信古、疑古、有夏、无夏以及二里头是夏非夏等问题的纠结中……对推进夏文化研究并无多大益处”,他认为夏文化探索即将迎来新的上升期。

李维明先生积极考察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中的早期文字,并取得一定成果。袁广阔先生亦在积极探索夏代文字线索,他将某些晚商甲骨文、金文象形字字形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器物的器形进行对比,进而推定该字的创造、使用年代。张国硕先生重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期待文字材料的发现。方辉先生相信夏代有文字,但因文字载体不易保存,故而发现文字“可遇不可求”。

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并不肯定是夏。他认为目前有关夏文化问题各位学者提出的各种说法皆是“推论和假设”。许先生将自证性文字作为判定夏夏的最主要依据。孙华先生认为若没有充分证据,则不应轻易否定夏代的存在,作为考古学家有责任通过物质文化资料去探索夏代,无论其能否证实。他认为根据考古材料研究与夏时期相当的历史,可以冠以“夏”字,亦可以不用“夏”字。

此外,秦照芬女士则对当前形势下台湾夏夏及夏文化研究前景感到忧虑。

总之,几乎所有学者都将“更广泛地开展田野工作”作为夏文化探索的展望。这无疑将会为夏文化探索积累更多材料,推进夏文化探索进程。大部分学者密切关注夏代文字问题,这是探索夏文化道路上不可忽视的议题。部分学者已经在积极寻找夏代文字线索。夏代年代学研究仍然是关键,如何处理14C测年数据、文献记载及人骨材料所示寿限之间的矛盾有待考量。还有不少学者提醒我们需要关注与夏王朝所处时空范围相近的考古学文化。此外,就考古学发展来看,科技考古及多学科合作是探索夏文化的必由之路。部分学者在面向夏文化课时表现出纠结,甚至略显矛盾的状态值得注意。如此复杂的心态或折射出夏文化探索课题的“时代性”。目前学界对夏文化本体的研究略显不足,结合诸位学者对夏文化探索的展望来看,未来直击夏文化本体的研究成果将会陆续出现。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

编著:张立东 王仲奇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